

方志彤與「他們仨」

● 木令耆

二十年前哈佛大學漢語文史系，有一位聞名的怪癖學者，他不但對中國古典文學修養淵深，而且精通西方文史語言，如希臘文、拉丁文、德、法、意大利文等等。他就是方志彤教授——一位今古稀有的學者。

每每想到他，便瞧見那如獅子似的一頭披散的銀髮。他身材高壯，面色紅潤，有如酒飲之後。他是哈佛大學的一位怪傑，他孤寡冷傲，可是只要他認為孺子可教也，他可能是你的良師好友。那麼他便會變得慈善忠誠。

方志彤便是我這樣的一位恩師，如果二十年前我未曾從師於他，今日我也不會在此以漢文來寫他。

半年前在北京與老友重逢，那是一位兒時小友。他知道我身居他鄉卻又喜讀中文書，便想送幾本書給我帶回美國，可又知道我一向輕裝旅行，因此只送我兩本書，其中一本便是楊絳寫的《我們仨》。我讀後感觸甚深，很是痛惜，便想提筆寫篇追憶錢鍾書的「他們仨」。

奇異的是提起筆來，腦海中只看到那一頭銀髮的方志彤教授。筆隨意念，寫下的是常常懷念錢鍾書的老同學，方志彤教授。

我首先是上上海陶瑋 (James R. Hightower) 教授的詩詞課，而他又使我去上方志彤的課。這兩位教授導引我回返漢文。

記得快離開中國時，正在南京上初中，一位同班同學警告我不可忘記中文：你爸爸帶你離開中國很不對，你應當以中文寫作。

方志彤先生不但將我回歸漢語，也啟發了我將遺失的中國文化，尤其是傳統中國文人的孤潔寡傲。他說他不能忍受庸俗，他是出污泥而不染的文人。因此他的教授方法也是奇特的。比如想上他的課，必須得到他的許可，並且他不願在教室中講課，只在他自身的辦公室講課，每次只收四五个學生，圍着他的寫字枱聽課。我便這樣的坐在他辦公桌旁聽了兩年課。

聽他的課，不但聽到漢語和英語，也會聽到法語、德語、拉丁文、

希臘文和意大利文。聽他的課有如遊學世界。他不大看得起讀書讀譯文的人，認為*traduttore é traditore*。這句意大利文的意思是指翻譯者是背叛者，翻譯未能達到原本意。這句話我也聽錢鍾書提過。他和方志彤是清華大學的同班同學，兩個人都精通數國文字，因此同樣對翻譯反感，瞧不起讀譯文的讀者。他們倆在這方面是同志，也是知心。

因為我在歐洲居住過，也懂少許意大利文和法文等，因此他對我也另眼看待，並且得知我也訂閱英國的《泰晤士報文學副刊》(*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*)，便說很高興有一個知音者在聽他的課。

上他的課如走進海闊天空的文化世界。我從來知道中國歷來有多元化的文化智慧，這文化智慧其實是世界文明大同的。

我第一次聽他的課是跟他讀《莊子》內篇第一至第七。〈逍遙遊〉最能代表方先生的文化境界：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。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！」

讀《莊子》，真是太神了，恰如魂飛神舞，「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」。莊子內篇——〈逍遙遊〉、〈齊物論〉、〈養生主〉、〈應帝王〉——所展示的文化境界正若上方先生的課，如支氏《逍遙論》曰：「夫逍遙者，明至人之心也。」

尤其讀到顏回與仲尼的對答：「何謂坐忘？墮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」（〈大宗師〉）

何謂大通？為之恍然。

讀《莊子》，上方先生的課，為之恍然也。

讀《莊子》時，方先生常常指出書中的相對論，可知莊子哲學其實是分析性的，而此分析性常常昇華於詩境。西方哲學常建議古典哲學只有希臘哲學開始分析性的思維，不知老莊思維也是分析性的，而是思維層次常進入詩意似的玄虛妙悟。這種悟解即是分析亦是形而上。

第一年跟方先生讀的是老莊，同時方先生也介紹了一些課外讀本，如林語堂寫的英文劇本《孔子見南子》(*Confucius Saw Nancy*)，寫的是孔子去見某官夫人，意圖找份官職。由此可知方先生對孔儒的一些看法類似惠施(莊子的好友)，菲薄孔子。這原是莊子的人生，他可官而拒，不像孔子周遊諸國，欲官而無，而流浪終生，惶惶如喪家之犬。

方先生的孤傲也使得他未肯去求份哈佛教授職位，始終是佔一超然的學者老師地位，只求一容膝的讀書做學範圍。他是海陶璋教授的老師，也是美國和西方許多漢學家的宗師。

錢鍾書曾經問過我在美國修漢學博士的要求，我說除了唸一些必修課外，加上能譯評一本漢文著作就差不多了，當然還要備修很長的參考註解等。他笑說幸好秦始皇燒掉許多古書，由此減輕不少博士生的負擔，說此話時，站在身旁的楊絳聽了不禁笑彎了腰。

第二年聽方先生的課是讀中國文學批評，如曹丕的《典論》、陸機的《文賦》、鍾嶸的《詩品》、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等。此時始知中國自古便有文學批評的著作，此其實也是分析性的文藝思維。

上方先生的課不僅是學習，而且是求知超過求學。由於方先生的人生觀，他在清華大學的學生時代便成為



(左起)楊絳、錢鍾書和女兒錢瑗攝於家中。

錢鍾書的知心之交。他們求學的願望不在乎獲得一官半職，而是處於單純的求知與對知識的基本興趣。他常與我談到他們在清華的學生時代，也珍貴保存了一幅錢鍾書給他的相片。他極少佩服學人的學識，多半笑嘲待之，尤其對希望做官的學人嗤之以鼻，說他們術而不學。但對錢鍾書他卻是愛戴不已。

方志彤和錢鍾書同樣是得罪人的高手。他們同樣是「庸人不可忍之」。他們明確悟解到自己讀書破萬卷，仍然有不解之處，怎能忍受那些輕浮自滿的偽學君子。

我對方先生有莫名的同情；我微微感到他的隱痛；每當提到錢鍾書，他便好像找到知音，也不必費心神去自我解嘲，他與錢鍾書有通靈之處。

1979年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派來一高級學者代表團訪問美國各高等學院，錢鍾書是成員之一。我有幸能接待這個代表團，並確定安排方先生與老友錢鍾書有機會聚敘。他們有一日

同坐一桌上聚餐，此後我也因此有幸得到錢先生的信任，並叮囑我去倫敦時去看他的女兒錢瑗。

一日我在倫敦，傅聰邀我去他家用晚餐，並說錢瑗也會來參加。傅聰約我同到地鐵站去接錢瑗，然後三人步行回傅聰家。傅聰父母與錢鍾書夫婦是摯友，因此傅聰與錢瑗是世交。我那晚與他們在一起敘談，感到一陣薄霧式的悲哀，或許他們觸動到了我對他們的同情、惋惜。在我心底裏我深深感覺到他們經過的苦難，和他們對父母的愛慕和關切。

再次見到錢瑗時是在北京師範大學。我與她同是外文系。也許就因為同系便沒有較多地私自交談，無形中避免一些猜嫌。可是去拜訪錢鍾書、楊絳倒有數次，每次去都渡過得很愉快，尤其看到他們倆孩子似的天真、坦誠和談笑自若，不時有幽默的談笑。

1986年我在北大，因為教課忙碌，沒能及時去訪問他倆。一天哈佛

到北大來的訪問學者提起想去見錢鍾書，我便為他撥了通電話給錢先生，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錢鍾書的反應是：我不想見陌生人，你自個來吧！

這也是我最後一次去看他們倆。1989年以後，我隔了多年才再去中國，只聽說他們抱恙不癒，我也覺得不便去訪問他們。心中卻常掛念着。

他們仨給與我的回憶是快樂的聚敘，不停的笑話連天。與他們在一起沒有忌諱的談天說地。可是有時會感到淡淡的痛惜，這是我對他們的痛惜。

這個世界的庸俗不是他們能妥協的，如同方先生，他從未降低他的標準去適應庸俗的措施。我常常想到高文化知識給他們帶來的痛楚，因為他們有不屈不撓的精神，使得他們孤傲，這也是傅雷的結局。我理解為甚麼錢鍾書與楊絳是傅雷的朋友，也是方志彤的朋友。

當錢鍾書的《管錐篇》出版後，我接到方先生那裏來的電話；他將開一課《管錐篇》的課，約我去聽課，這是我上方先生最後一堂的課。

之後我又常回中國，也來不及與方先生辭別。我最後一堂課也與錢鍾書有關。

我開始讀楊絳的書《我們仨》時，並不知只剩下楊絳一人了。讀到楊絳夢似的敘寫，我感到生存在虛無飄渺間。我重新看見他們仨，夢似的再遇見他們仨。

夏日倫敦的一個黃昏，錢瑗到我居住的倫敦大學來訪，她下了出租車，手提一大皮箱，本以為可以在我處下榻，可惜我居住的宿舍不便留客，我們只一起吃了頓晚餐，晚上她便去使館招待所留宿。對於未能盡情招待她，我甚感遺憾。

回憶那晚我們在一起談到荒謬派的戲劇，她說她收集了一些荒謬派的錄像片帶回北師大。那時也是我對荒謬派極感興趣的時候。那晚錢瑗也提到父母倆是多麼親切的知音。

在楊絳的書裏，我才發覺到錢瑗加上父母形成他們仨；這三位一體的他們仨。他們在感情、知識和精神上形成了他們仨。在痛苦的人生旅途中，他們在精神上是永恆的三位一體。

讀到錢瑗對父母的掛念和苦苦的關切，至死而不放心，我為之痛惜。讀到楊絳最後剩下她孤痛一人，我更為之痛楚。尤其看到她寫第三部的題目是：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。

《我們仨》的第一部是虛實飄幻的寫法：「有一晚，我做了一個夢。我和鍾書一同散步，說說笑笑，走到了不知甚麼地方。太陽已經下山，黃昏薄暮，蒼蒼茫茫中，忽然鍾書不見了。我回顧尋找，不見他的影蹤。我喊他，沒人應。」這一段完全將楊絳的失落心神寫出來了。

我認識了他們仨，是因為我是方志彤先生的學生。因此我追懷他們仨，不禁也追憶方先生。

在一個追悼會上，我遇見了方先生的遺孀。她是歷史系的教授。我告訴她，是方先生重新帶我回到漢語文化。由於方先生，我幸識《管錐篇》的作者——錢鍾書先生和「他們仨」的楊絳、錢瑗。

身在遠遠的大西洋彼岸，我遙祝楊絳，但願人常久。

木令耆 哈佛大學費正清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